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一六四〇年 英国革命史

〔法〕F. 基佐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

〔法〕F. 基佐 著

伍光建 译

靳文翰 陈仁炳 校

商 務 印 書 館

198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

〔法〕F. 基佐 著 〔英〕W. 黑兹利特 英译

伍光建 译 靳文翰 陈仁炳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685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316 千

印数 4,100 册

印张 14³/₄ 插页 4

定价：2.9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年10月

出版前言

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一章。这场革命爆发于 1640 年,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复杂的斗争和内战,终于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专政。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它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英国后来握有世界霸权、成为“日不没国”的基础。英国革命的意义远远超过大不列颠岛及爱尔兰岛范围,这场革命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水中,激起了千重浪涛,波纹远达欧洲大陆、美洲以至全世界。

本书作者基佐着手撰写此书于英国革命发生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有条件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因此本书内容相当丰富,叙事相当详细生动,当年英国革命烈烈轰轰的情景跃然纸上,读来颇饶兴味。基佐是亲身经历法国革命的法国人,他写作此书时十分注意将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对照,特别是他所写的“第一版前言”,简直可以说是一篇关于英法两国革命关系及其对比的长篇论文,内中不乏值得一读的观点。

基佐是法国的反动政客,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历史学界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曾试图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英国革命以及其他历史事件,其主要用心在于证明资产阶级有权管理国家。他没

有、也不可能接触到私有制的起源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从阶级关系中揭露出剥削关系，没有、也不可能在他的著作中坚持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局限性的必然反映。他在写作《英国革命史》的整个过程中就表现了这种始而运用、继而彻底放弃阶级斗争理论的变化。在 1826 年出版的《英国革命史》上篇中，他倾向于证明处死英王查理一世是正确的。但到 1854—1856 年出版中篇与下篇时，他则竭力攻击英国革命，大事赞扬 1688 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宫廷政变，并且出尔反尔地把处死查理一世说成是“大暴行”了。

这个中译本只译了本书的上篇，系根据 1845 年出版的黑兹利特的英译本转译的，书的全名为《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从查理一世即位到他的死亡》。英译者是否翻译了后来出版的这部英国革命史的其余各篇，未见说明，我们在国内也未找到后面篇章的英译本。伍光建先生早在 1936 年便译出此书初稿，1941 年作了修改。1983 年靳文翰、陈仁炳教授作了校订，他们校订时是根据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伦敦出版的黑兹利特的英译本。

本书后有附录十五篇，多半为文件，中译本未译。英译本中有许多脚注系说明史料出处的，如引自《议会历史资料》、某人致某人信件等等，这些均未译出。有些解释性的脚注已经译出，但英译本未说明系作者注抑系英译者注，因此中译本对这些脚注也未标明注者为谁。中译本只在译者所注或校者所注时作出说明。英译本中的索引未用，我们根据这个索引改制了一个“译名表”，附于书后。

中译本序

先父伍光建(1866—1943),广东新会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几道)颇加器重,派往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深造五年,兼学西方史学和文学。清朝末年,夏曾佑和先父分别写出《中国历史》和《西史纪要》,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张元济认为二书乃国内第一部的中国和西洋通史,即予出版,流行极广,引起当时史学界的重视。茅盾先生的母亲给他购买书籍的目录,列此二书(《中国新文学史资料》),亦可想见其影响。先父的译作以小说为最多,其次便是历史和传记名著,在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主要有麦尔兹《十九世纪思想史》、弗罗《拿破仑》、路德维希《俾斯麦》等。目前尚未发表的有金斯莱《古希腊英雄记》、基佐《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斯梯芬·格兰汉姆《俄皇大彼得本纪》、麦考莱《英国史——查理一世》、汉米尔顿《英法两宫秘史》、路德维希《七月十四日》、斯梯芬·茨威格《福煦》等。其中,基佐《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论述欧洲首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名著,影响很大,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所以商务印书馆特予出版。

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1787—1874)是法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于七月王朝的金融贵族统治时期,历任内政、国民教育、外交部部长和总理。1848年2

月,法王路易-菲力浦拒绝改革选举制度,巴黎工人和革命群众武装起义,推翻王朝,基佐被迫去职。他的历史著作很多,有《查理一世—查理二世时期的英国革命史》(其著名英译本即《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克伦威尔的英国共和史》、《克伦威尔护国政府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始末》、《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法国历史——儿童读本》等。基佐的历史观是资产阶级的:一方面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第三等级有权利推翻封建贵族的统治;另一方面否认第三等级(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已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看不到资产阶级统治下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这种观点反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本书也不例外,但读者是可以批判态度对待它的。

靳文翰、陈仁炳二同志校阅译文,特此志谢!

伍 蠡 甫

一九八三年元旦

目 录

1. 英译者黑兹利特的说明	(1)
2. 第一版著者前言	(2)
3. 1841 年版著者序	(16)
4.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	
第一卷 1625 至 1629 年	(17)
第二卷 1629 至 1640 年	(53)
第三卷 1640 至 1642 年	(108)
第四卷 1642 至 1643 年	(187)
第五卷 1643 至 1645 年	(232)
第六卷 1645 至 1646 年	(291)
第七卷 1646 至 1647 年	(324)
第八卷 1647 至 1649 年	(385)
5. 译名表	(460)

英译者黑兹利特的说明

基佐先生在后面的前言中所作的关于他的著作的性质的充分说明,使我没有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因此,我只说明一点,在翻译过程中我的愿望只是尽可能接近地按照作者自己的风格表达作者的原意;至于我是否已经成功地达到此目的,那就要凭别人来判断了。至于引用的书籍、文献、演说,我都无例外地回溯到作者所参阅过的资料来源,并将各作者或演讲者的原话一字不改地刊出。在注明他的征引来源时,基佐先生常应用他自己关于英国革命的《回忆录》的版本(那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出版物);我的英译本中所使用的资料,都是从所引著作的每一种最佳的英文版本引用的。现在印出的内容丰富的索引,是一个新的项目,我相信它也将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黑 兹 利 特

中寺法律学院

1845 年 12 月

第一版著者前言

我出版过关于英国革命的原始的回忆录；我现在出版英国革命的历史。在法国革命以前，这肯定是欧洲必须讲述的最伟大的事件。

我是不怕英国革命的重要性被贬低的；法国的革命，尽管是后来居上，但并没有使英国革命本身的伟大少了一些；它们都是同一个战争的胜利；它们都使同一个事业得到好处；胜利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它们并没有彼此使对方失色，反而交相辉映。我只怕它们的真正性质会被弄错了，只怕世界不给予它们在世界史中应由它们占有的地位。

依照目前流行很广的一种看法，好象这两个革命都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这些事件是从前所未闻的原则中产生出来，从前所未闻的筹划中孕育出来的，它们竟然导致社会脱离它的古老而自然的轨道；总之，它们象飓风、地震等完全脱离自然规律的神秘现象一样；它们就象造物之神的打击一般，突如其来，也许是进行破坏，也许是进行创新。不论是朋友或敌人，不论是对革命颂扬或诽谤的人们，都采取这种看法。在前一类人看来，革命是光荣的事件，它们第一次为人们发扬光大了真理、自由和正义，而在它发生以前一切都是荒谬、不平与暴政；人类只有依靠它才能获得尘世的拯救。在后一类人看来，革命却是最可叹的灾害，它中断了一个漫

长的智慧、道德与幸福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做这种坏事的人宣告的主张、提出的要求、犯下的罪行都是史无前例的：认为在一阵疯狂中各国都已从他们习以为常的道路上冲出路外，而脚下则是一个敞开的深渊。

如此，无论是颂扬或谴责，无论是祝福或诅咒，在考虑到革命问题时，各方面都忘记了革命的客观环境，他们同样地将革命和过去绝对孤立起来；他们同样地要革命负担起世界命运的责任，而且不是对它大加咒骂就是将一切光荣堆在革命的头上。

现在是清理所有这些虚妄的和幼稚的慷慨言词的时候了。

革命不但远远没有中断欧洲事物的自然进程，而且可以说，不论在英国或法国革命中，人们所说所望所作的，都是在革命爆发前已经被人们说过，做过，或企求过一百次的。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为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利，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教会曾多次重申托利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法令中记载的圣·伊西多的话：“依正义统治其人民的才是君王；凡不如是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就不再是君王。”人们反对特权，并企求在社会秩序中引进更多的平等；全欧洲的君主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一直到我们的时代，关于公民平等的进步的一些步骤，都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且可由皇权的进步来衡量的。人们要求，公共职位应该向广大公民开门，应该仅仅依照本人的长处来进行分配，而且权力只许通过选举来赋予：这是教会的内部治理机构的根本原则，而教会不但一贯根据它们行事，而且曾经强调宣告此项原则的价值。因此不论我们考虑到英法两个革命的总的原则，或者它们应用这些原则的结果——也就是说，

不论我们考虑到国家的治理，或者公民权利立法，财产或人身，自由式权力——我们都找不到任何一件是它们本身所创造出来的，也找不到一件在过去我们称之为正常的世代里不曾见到过，或不曾存在过的。

而且不仅如此：那些被认为专门属于英国或法国革命的原则、意图、努力，事实上不但早于法国、英国革命前几个世纪已经存在，而且恰恰正是归功于同样的原则和努力，欧洲的社会才取得了它的一切进步。难道封建贵族是通过封建的秩序混乱、它的特权制度、它的残酷的暴力以及它对呻吟在它枷锁之下的人们的压制，难道他们是通过这些才参加各国的发展的吗？不是的：他们反对了皇族的暴政，他们行使了自卫的权利并保持了自由的准则。各个国家为什么要祝福君主呢？这是因为他们自称具有天赋权利、具有绝对权力吗？是因为他们的穷奢极欲，因为他们有个宫廷吗？不是的：君主们攻击过封建制度和贵族特权，他们将举国一致带进了立法，带进了行政机构；他们促进了平等。至于说教会僧侣们——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促进了文明？难道是由于他们自外于人民，由于他们反对人类理性，而且以上帝之名批准暴政吗？不是的：那是由于僧侣们在教会之内，在上帝的法律之下，一视同仁地聚集了大人物和小百姓，穷人和富人，弱者和强者；它尊重并且培养了科学，建立了学校，赞同知识的传播，并使智力活跃起来。我们不妨探讨支配世界的大师们的历史；查看一下决定世界命运的各阶级的影响；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见有善良表现出来，只要看见人类对一宗伟大的贡献产生永久的铭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就是引导到英国的和我们法国的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的具

体步骤;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所面对的正好是两国的革命所企求建立的原则。

因此, 不要把这些强有力的事件看作欧洲史上的妖怪的幽灵吧; 不要让我们再听到有人说它们是闻所未闻的妄自尊大, 是罪大恶极的发明吧。事实上, 它们将文明在它已走过十四个世纪的道路上再向前推进; 它们公开宣告了人类从有史以来赖以发展其本性、改善其处境的准则, 将人类的事业加以推进; 他们做下了曾经先后由僧侣们、贵族们和君王们立下功绩和发出光辉的事业。

我不认为人类仅仅由于英法两国的革命应对错误、灾难和罪恶负责, 就长期坚持绝对谴责两国的革命。我们完全可以全部承认有过这些错误、灾难和罪恶, 不仅如此, 我们可以做得比他们的谴责者还要严厉一些, 细密地查考他们的控诉并补充其缺漏, 并号召那些谴责者们, 也反过来开列一下他们维护的时代和掌权时造成的错误、罪行和灾害: 我深深怀疑他们是否敢于接受这个挑战。

人们可以这样问一下: 这两个革命明显不同于任何其他时代的区别究竟何在? 他们究竟是以什么来实现多少年代的人类共同事业而赢得了革命的美名, 且在事实上改变世界面貌的? 答案是这样的:

不同的权力曾经先后在欧洲社会占有支配地位, 从而轮次领导了文明的前进。在罗马帝国灭亡及蛮族的入侵以后, 在一切纽带断绝之后, 各种经常性的权力都被毁了, 各地的统治权沦入暴力之手。胜利的贵族攫取了一切, 人身与财产、人民与土地。少数的伟大人物如法兰西的查理曼, 英国的艾尔弗雷德都曾企图使这种混乱变成王朝制度下的统一, 但都归徒然。任何统一都是不可能

的。封建的政体是唯一可为社会接受的方式。它渗透在一切之中，教会、国家莫不如是；主教们和修道院长都成了贵族，而君主只是首席勋爵而已。可是，尽管这样的结构是粗糙的和固定的，欧洲第一步脱离野蛮主义还不得不归功于它。欧洲的文明正是从封建的领主中，从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们的法律习俗中，以及从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里开始的。

在人民的身上，封建领主的重压是很可怕的。只有僧侣代表全体社会得到一点点理智、公道和人道待遇。在封建统治体制内无一席地位的人，除了教会以外就找不到庇护，除了教士之外也得不到保护人。尽管这种安全庇护是有限的，但是它却是巨大的，因为别无他途。不仅如此，只有教士才能够对于人的道德本性提供一些食粮；也就是对于战胜了一切障碍、克服了一切灾祸的不可遏止的思想上、知识上、希望和信念上的追求提供食粮。于是教会就在欧洲各地取得了惊人的力量。本身原是贵族的人也借助于教会的协助增大了自己的势力。支配一切的不复是胜利的贵族，而是僧侣了。

皇权由于得到教会的合作，以及它自身的力量，皇权兴起了，它超过了它的对手；但是曾经给予助力的教会，现在却企图奴役它了。在这个新危机中，皇权有时候求助于目前不那么可怕的贵族们，但在更多的时候则乞援于普通百姓，人民已经强大得足够给予可观的助力，却还不够使他们敢于为他们的效劳提出高价。通过他们的协助，皇权在他们的第二次斗争中胜利了，进而成为统治力量，得到一些国家的信任。

这就是古代欧洲的历史。封建贵族，僧侣，以及皇权，依次地

占有过它，成功地支配过它的命运和进步。也就是由于上述各力量的共处及彼此之间的斗争，欧洲在一个长时期内取得了自由、繁荣和开明；换言之，发展了欧洲的文明。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上述三种力量之间的一切斗争都停了下来；他们处于一种停滞不动的和平中。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失去他们在历史上的特色，甚至连构成他们当初的权力和辉煌成就的那些奋斗，也从记忆中消失了。贵族不再保护公共自由，甚至自己本身的自由也不加关心；皇权不再热中于取消贵族的特权；恰恰相反，皇权好似对拥有特权者格外优待，以换取他们对君主的驯服。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僧侣，害怕起人类思想来了，而且由于不再有能力指导思想，就威胁着要求它停止起作用。但是文明仍旧走它自己的道路，日复一日更加普遍展开，行动更加活跃。人民发现自己已被古老的领袖们抛弃，人民对这班领袖的冷漠态度以及他们所表现的心情大感惊奇，同时，人民因见到自身在权力和欲望日益增大之时却行动较少，于是就开始想到，最好自己起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于是就挺身而出承担过去的领袖们不再履行的职责，同时向皇权要求自由，向贵族要求平等，向僧侣要求人类理智的权利。这么一来，革命爆发了。

为了一个新的权力的利益，革命作到了在欧洲其他几个事件中已经数次目睹到的事情：它们对社会提供了愿意并有能力在它的进步道路上指导它的领导者。就是由于领导者这个称呼，贵族、教会和皇权先后轮个地享受过优先支配地位。现在人民也以同样的方式，并为了同样的需要，具有领导者这个称呼。

这就是英国革命和我们法国革命的真正的行动经过和真实的

特点。在认为二者确是绝对相象以后，又有人说二者之间除形似而外并无共同之处。有人认为，英国革命与其说是社会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至于法国革命，却认为它企求一举而改变社会和政府；有人认为前者寻求自由，后者寻求平等；有人认为前者仍旧是宗教的革命多于政治的革命，只不过以一种教条代替另一种教条，以一种教会代替另一种教会；而法国革命则更多地是哲学的革命，它要求理性的完全独立；以上这些看法确是一种聪明非凡的比较，其中也不无一些真理，但是仍不免是近于浮浅之谈，同它居然说要予以纠正的看法一样地浅薄。两个革命在外表上相似，但仍然可以辨出巨大的不同；但同样地可以说，二者虽有不同，仍然隐藏着更加深刻的相似之处。确实如此，英国革命，由于早于法国革命一个时代中所存在的导致他们革命的种种原因，保存了古代社会情况所留下的更加明白无误的印记：在那个古代社会中，起源于野蛮主义深渊之中的自由制度，居然能从它们所不能防止的专制主义中残存下来；封建贵族，至少一部分封建贵族，曾经将其事业和人民联结在一起；皇权，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也从来不是权力的全部所在或不受阻扰的绝对权力；国家教会自身在开始进行宗教改革，并发动了大胆的思想上的探索。在法律、信仰、人民风习等各方面，革命的工作已经完成其半；在革命企图加以变革的事物中，同时出现了助力和障碍，也同时出现有用的盟友和仍然有力的敌人。这么一来，就出现非常奇特的一种各成分的混同体，表面看来是矛盾之至，既是贵族的又是人民大众的，既是宗教的又是哲学的；此时诉诸法律，彼时又诉诸理论；此时宣布一种新的良心上的桎梏，彼时又宣告它的完全自由；此时严格将自己限制在切实可行的范围之